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二辑

DANGDAI ZHONGGUO TUSHUGUANXUE YANJIU WENKU

MuLuXue Yu WenXian

LiYong

目录学与文献利用

倪晓建/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目录学与文献利用

倪晓建 著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目录学与文献利用/倪晓建著.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10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二辑)

ISBN 978 - 7 - 5013 - 3750 - 7

I. 目… II. 倪… III. ①目录学—文集②文献检索与利用—
文集 IV. G257 - 53 G354.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9541 号

书名 目录学与文献利用

著者 倪晓建 著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75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750 - 7/G · 772

定价 48.00 元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 主编：**吴慰慈 陈源蒸
- 编委：**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馆员
郭又陵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李万健 中国图书馆学报编审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
- 倪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谭祥金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引麓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总 序

在人类文明史上,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的产生几乎一样源远流长,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相互交叉的联系,在追溯历史渊源和面向现实与未来中,有着同源和相互应用、共同发展的关系,有鉴于此,编委会将文献学和目录学研究合为一辑,列入《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中。收录在本辑中的有倪晓建、王余光、陈力、王世伟、柯平、王新才、徐雁、王国强等当代中青年学者的文集。倪晓建、柯平、王新才、王国强主要研究目录学。其中倪晓建通过提出精萃信息理论而深化了目录学研究;柯平则以数字化目录学研究创新了现代目录学理论;王新才于目录学发展多所着力,对目录学演进的阐释相当独到;王国强深于古典目录学研究,尤其是汉代与明代,更是其着墨重点。王余光、陈力、王世伟等人则主要研究文献学,其中王余光主要研究文献史与文献学理论,陈力、王世伟则于版本、目录、校勘等方面用功甚深。徐雁的主攻方向是藏书与读书。这些中青年学者思维敏捷,才华出众,成绩卓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一种潜心学问、甘于寂寞并扎实钻研的精神,这是非常难能可贵并值得提倡的。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今年正好是30年。30年中,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几位中青年才俊,或在这一年,或在这之后不久,陆续步入图书馆学的殿堂。虽然这些进步不能说就是他们的功劳,但他们的研究无疑起了相当的促进作用。他们的成果是新时期图书馆学、文献学与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记录。也许有人会质疑,那些注重思辨考证的“纯粹”的研究有什么用呢?胡适当年就曾把考证一个古字与发现一颗新星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具有相同的价值。考证古籍版本、研究藏书目录有什么用呢?这些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却

繁荣了学术文化。考证古籍版本,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思想;探讨藏书目录,有利于了解各时代藏书情形,也对今天的藏书建设有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从藏书、目录、版本等研究出发,还可以推荐图书、指导阅读。这几位中有不少致力于这种研究,也有不少还在致力于这种实践。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献信息资源的管理,更应当探讨如何让这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目录学,作为一门智慧之学,它教给人们的便是学会如何在浩瀚的文献知识和信息的海洋中迅速准确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的本领,拥有这种本领和能力将会终身受用无穷。如果读者能从图书馆了解到怎样读书、有哪些书可读、书以哪种版本为好、先读哪些书、后读哪些书、哪些书需要精读、哪些书只需浏览,这样,就可以说图书馆在建设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中充分发挥了文化教育的功能,也可以说我们的文献学、目录学研究并非全然虚不可用。文献目录之学本来就是致用之学,而其所致之用,应该说正是这些方面。

2 这些中青年学者是正在成长中的大树。他们潜心钻研,开拓创新,吸取养分,并逐渐枝繁叶茂。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图书馆事业这片沃土,而图书馆事业也因他们的研究而变得生机勃勃。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终将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顶梁柱。是为序。

彭斐章

2008年2月于珞珈山

序

倪晓建是我招收的第一届目录学专业研究生,从1978年起到现在已有30年了。30年间,对他的学习和工作我特别的关注和留意,他在学术研究中的每项成果以及工作中的每项成绩,我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

收录到这部文集的30余篇文章,是他学术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从中不但可以领略他那种求真求实的扎实的治学风格,也可看到他不断探索开拓的创新精神。

他的研究不囿旧说,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关于《七略》有无互著、别裁两种著录方法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他根据当时的书籍制度以及刘向、歆等人分工整理那些书积如丘山的实际情形,通过对《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出”、“入”的比对研究,认为《七略》对图书的著录有互著、别裁的现象,但是,刘向、歆等人并无互著、别裁的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当时书籍散乱和分工整理等因素无意中形成的。又如,《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图书数量“篇”、“卷”的著录,在查阅大量资料多方求证的基础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并不一定都符合当时的史实,但毕竟是在追根求源基础上得出的一己之见。关于书目类型的划分,过去有多种划分标准,意见很难统一。他从解决文献众多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求之间矛盾这一书目工作的本质入手,研究并构建了文献加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多种加工方法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角度描述、解释、评价、提炼、浓缩、处理、链接文献,以满足人们多角度的文献需求。根据文献加工特点以及用户对文献信息的具体需求,他提出了六大文献信息加工体系,即:描述性信息的加工、整体性信息的揭示、周遍性信息的处理、鉴选性信息的提取、研究性信息的撰写、相关

性信息的组织。这一体系的提出,不仅推进了书目工作实践,也丰富了目录学研究的内容。

他的研究着力于解决用户对文献的实际需求,认为以往对文献信息的加工存在五种倾向:重学术性研究,轻实用性开发;重线索的提供,轻实质性信息的给予;重钥匙指路功能,轻直接性信息提取;重整体性信息加工,轻单元信息的筛选;重文献本身,轻用户利用。根据对上述现状的分析,面对用户的信息需求,在对以往文献信息加工方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精粹信息”和“功能信息”两种文献信息加工概念。为了推广这两种文献信息加工方法,他不仅论述了它们的功能定义及加工处理方法,而且分别以精粹信息、功能信息为名称建立了可以检索利用的数据库,并且不失时机地在国内外学术研讨会上解说这两种方法,其求实求用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他的研究敏锐朴实,面向实际捕捉新事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界不断有文章论述类书消亡的原因,其观点有政治原因说、文化原因说、学术原因说、百科原因说。对此,他在教学和研究中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八十年代末,我国出现了新类书的编撰,他及时察觉到这一现象,就此发表了《当代类书简论》、《类书新编,传统有续》等研究文章,较系统地论述了新类书的特点、体例、功能等问题,并对类书之体不会终结的观点进行了阐述。八十年代中期关于“名录”的研究,同样也是较早的对这一工具书类型进行的系统论述。

文集中有《图书馆工作偶拾》、《新岗位、新思考》、《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几篇文章,是他谈图书馆工作中体会的。我曾问过晓建,以前做教学工作,现在做图书馆工作,对此有何感想?他答:在图书馆工作能将书本上讲的以及研究的成果应用在实践中。是的,看到他的研究论文,再看他所担任馆长的首都图书馆的现状,我相信,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和图书馆实际工作中,他会把两者结合得更好!

彭斐章

2007年9月

目 录

刘向、刘歆和《别录》《七略》	(1)
编撰《七略》的几个基本因素	(5)
试谈《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史内容	(11)
互著别裁方法考略	(19)
中国目录起源于何时?	(24)
《汉书·艺文志》的编撰及其特点	(28)
谈谈《汉书·艺文志》中的篇和卷	(38)
试论《汉书·艺文志》对我国书目编撰的影响	(40)
从蔡尚思开书目谈起	(49)
高校图书馆的书目利用问题	(51)
台湾地区的书目服务概况	(58)
文摘编写法	(65)
授业有方的导师——彭斐章	(79)
提要及提要编写法	(83)
困惑书目工作发展的几个问题	(107)
古典书目	(113)
走向新世纪的信息加工	(123)
精粹信息鉴选研究	(130)
请读书目	(138)
年鉴开发利用二十例	(140)
文献检索与利用著作体例十二种	(145)
利用名录获取机构资料	(150)
关于“文献检索与利用”教材主题标引的思考	(157)
当代类书简论	(163)

类书新编 传统有续	(169)
社会科学图书馆深度开发文献资源的新途径	(177)
类书之体 延绵有续 ——纪念《永乐大典》编纂 600 年	(185)
关于图书馆学教育和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193)
浅谈海峡两岸图书信息教育	(199)
大学信息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思考	(208)
新环境 新思考	(218)
图书馆工作偶拾	(224)
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233)
主要论著目录	(236)

刘向、刘歆和《别录》《七略》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在历史的发展中涌现出许多发明家、创造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在我们图书馆界，且不谈夏、商时代甲骨简册的收藏管理和起目录作用的文字标示，也不讲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整理六艺群经，以及后来编定的专科目录，就西汉末年（公元前6年）刘向、刘歆等人校整国家图书所编纂的《别录》、《七略》而论，就足以称得上世界之最了。刘氏父子不仅奠定了政府图书馆系统藏书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开创了编纂综合目录的先例。《七略》中形成的图书分类体系比德国吉士纳的《万象图书分类法》要早一千五百多年。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事业一直为后人所称颂。

《别录》二十卷，是刘向等人为每部图书撰写的叙录总集，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以来的学术著作内容。这部图书提要巨著的形成，前后大约耗用了二十年的光阴，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图书篇章混乱、编次不一、“积如山丘”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为了恢复图书的本来面貌，刘向首先从校讎入手。其工作程序是：校勘定本。搜罗各种本子互相比较补充，删除重复，条例篇章目次。这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从残存的叙录中，我们可知在校勘中用了许多公私藏本，如：“中书”、“外书”、“太史书”、“太常书”、“臣向书”、“臣某书”等，仅《管子》一书就用了中书（389篇）、太史书和三种私人藏本。其次是缮写清本。把校整好的定本清楚地抄写在整治好的竹筒上，“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于之”（《太平御览》卷606引《刘向别录》）。最后一项工作是由刘向撰写叙录。“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前两项工作不属于目录工作的范围，所以后人有的就认为刘向的工作是校讎学上的事情。实际上这种看法和当

时的历史现状有些距离,把手段和方法当成了目的。东汉和南北朝时的学者对刘向这项工作早有认识,纷纷仿效刘向整理图书的故事编纂本时代的目录。总之,刘向的事业应属于目录学的范围。

刘向给每部书写的叙录,从现存的八篇中我们大略可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一部书的版本和校讎经过。叙述各种本子的来源,篇卷以及文字差误和校讎后新本的篇卷数目等。关于一部书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关于一部书的内容大意。包括书名含义、写作目的和学术价值。这种揭示图书的方法,是目录学史上的光辉成就。

另外,通过对所有图书的整理,从而使汉代图书有了一部清册,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图书清册。刘向等人博学多识,所作的叙录重在学术,对于促进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汉记》中记载:“孝武皇帝时,董仲舒抑拙百家,到刘向父子,典校经籍,而新义分方,九流区别,典籍益彰矣。”

《别录》实际上是由刘歆清理刘向的叙录时,仿照《诗》、《书》之序的体例,汇辑而成的。以《别录》为基础,刘歆又在很短的时间内编成《七略》,和《别录》同行于世。《七略》七卷,是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它把所有图书分成七大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是总括其他六略的学术简史,用以容纳《七略》的总序和大、小类序,实际上只有六大类,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经典、哲学、文学、兵书、占卜和医学。六类下又分三十八小类(第二级类目),六百零三家。总计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这个图书分类表的组成对后世的图书分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讲图书分类学的历史都以此为其端倪。从六大类三十八小类的分类体系看,似乎只是把当时的图书类分部次了一下,实际上是刘歆等人把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作了类分和总结,它集中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思想和利益。从类目的设置和图书的排列次序上体现了社会的真实感情,勾画出一幅真实简明的西汉末年文化学术的画卷。对于研究先秦及西汉的历史和哲学史的人来说,尤其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七略》尽管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但就目录学的一些理论

和方法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首先,它把《易经》看做是五经的本源,其他则是“相互备用”的枝蔓,这比起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天道观有一定的进步性。其次,六大类中尽管以六艺群经为首,诸子略中也以儒家为尊,但是对诸子百家也能做到科学的处理,认为它们“其言虽殊”,和水火一样也可以“相灭亦相生”,只要“舍短取长,可以通万方之略”,较好地处理了儒家经典和其他学派的关系。另外目录体例严整详备,为后来的目录编制树立了楷模,近两千年来的目录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它的遗规下进行的。略有大纲,种有小序,家有提要。著录图书,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次。从清代开始,许多人还认为《七略》已经运用了一书两用的“互著”和一部书中某一篇文章别出入于他类的“别裁”著录法,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由于当时书籍制度本身和竹帛散乱等客观条件造成的,后来由章学诚才上升为理论。总之,《七略》在一千九百多年前就以目录的形式科学反映文化学术,全面系统地记录科学成果,确实是文化史上的光辉成就。

《别录》《七略》的产生与当时社会有直接的关系。西汉王朝建国后一直重视图书的求访工作,几次颁布命令于全国,到汉武帝时就已集中了大批图书。在学术上,汉王朝吸取秦灭亡的教训,顺应它自身的发展规律。建太学,置博士,鼓励读经讲学。汉武帝以后的学术空气和大一统的思想尤其对它的产生有很大影响。《别录》《七略》的成就则与刘向、刘歆的博学多识是分不开的。刘向是西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大师,是汉皇族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家产过百万”,从小“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汉书·楚元王传》),精通阴阳五行说和今文经学。汉成帝非常重用他,“每进见,常加优礼”。刘向一生除了参加政治活动外,主要从公元前二十六年受旨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领导了这次规模宏大的图书校整工作,这项工作还没最后结束就去世了,他的心血和博学的知识基本上都倾注到《别录》这部巨著上了。刘歆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一位经学专家,并擅长于天文学。他“俱好古,博见强记,过绝于人”,自幼精通《诗》、《书》。在与他父亲同时整理图书的过程中,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七略》是在《别录》基础上删简次序而成的,里

面贯穿着他的古文经学思想。

刘向、刘歆所编纂的这两部目录杰作,早在唐末佚失。班固《汉书·艺文志》依《七略》编成,还可以窥见它的一斑。对于这部目录学史上的文献,历代学者都很重视,有的认为不读它,就不能读“天下书”;有的更把它当作一部学术史料来讲先秦的历史和哲学思想派别;最近看到有些老先生培养研究生,把它列为必读书目之内。研究历史、哲学史、思想史需要它,考辨古籍的真伪和学术渊源需要它,阅读先秦诸子百书更离不开它。但是过去我们对这份珍贵遗产重视不够,还局限于一般的考证和目录学方法、理论上,真正把它当作一部学术文化史来研究,还需大家共同努力。

原载于《图书情报知识》,1980年第1期

编撰《七略》的几个基本因素

《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书目。它把书目编纂和学术思想史、科学技术史联系在一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范文澜说:“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是光辉的成就。”^[1]两千年来,它对各种书目的编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指导读书治学中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关于《七略》的编制方法和取得成就的论述前人已有涉及,下面仅就它取得成就的几个主要因素简略谈谈,供书目工作者参考。

—

国家重视和选派有学识的专家任职,是《七略》取得光辉成就的最基本的因素。汉兴,统治阶级吸取秦王朝灭亡的沉痛教训,在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治方针的同时,在文化学术上也相应采取了积极措施。当时,虽然黄老思想比较盛行,但是儒家学术也占有一定地位,民间一些经书开始流传讲授。文帝时,“诸子传说,尤应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到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儒家经传得到了发展。“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2]在文化学术发展、统一的同时,政府特别重视图书的搜访工作。“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3]惠帝时,又颁发了“除挟书律”的命令,武帝时的藏书已很可观。汉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经过全国性的搜求,天下匿藏图书基本上集中到中央秘府。除政府外,有些地方官也注意求访民间图书的工作。从汉初到公元前二十六年,一百多年的图书积累和文化学术的发展,给《七略》的编

制奠定了基础。汉成帝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亲自组织了这次图书编目工作,他“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4]成帝死后,哀帝继续支持了这项工作,“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这项开创性工作一直进行了二十年,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组织和大力支持是很难成功的。

编制一部书目,组成一个业务水平高的书目机构是相当关键的。被任命的几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各科专家,他们分管《七略》的有关部类。总撰官刘向是皇帝的宗室,自幼精通经术,十二岁做掾郎,二十多岁就当上了谏议大夫参与国家政治斗争。他参加编撰《七略》之前,可以说已经渡过了两个不同的斗争生涯,对于思想的转变和学术的成熟起了一定的作用。公元前六十八年至前四十年,是他学习和参与政治活动时期。他热诚维护汉家的统治,和肖望之、周堪等人联合起来,企图削弱外戚的权力,结果归于失败,使得他的思想发生了一定变化。从公元前四十年到前三十二年,由于斗争的失利,丢官隐居了八年。在此期间写了《疾谗》、《救危》、《世颂》、《摘要》等著述,以期有益于政治。被任命参加编撰书目的前六年,刘向再度回朝,并做了“备顾问、职进谏”的光禄大夫。由于他经常接近皇帝,对成帝的思想宗旨是心领神会的。四十多年积累的学术知识和忠于汉王朝的主导思想,在书目编撰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刘歆和他父亲刘向一样,也是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天文学家。从小“俱好古,博见强记,过绝于人”。^[5]二十六岁开始跟父亲校勘图书,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学习和锻炼,他对六艺群书无所不究。《七略》的最后形成,与他的博学和精心种别是有直接关系的,《汉书·刘歆传》说:“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负责兵书的任宏是一位既有书本知识又能领兵打仗的专家,对如何整理编次兵书在杨仆《兵录》的基础上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完成了兵书一略的编撰任务。尹咸、李柱国和任宏一样,是当时很有声望的人物,根据他

们的特长,分别撰修术数、方技二略。以这几位有精深造诣的专家为骨干,另外还配备了一些有学识的青年助手如班固、杜参、王龚等。班固博学多识,左将军史丹举为贤良方正,通过金殿对策,官为郎议。成帝很器重他的才学,赏赐他许多秘书的副本。杜参擅长诗文,刘向《别录》中说:“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根据他的特长,很有可能是《诗赋略》的负责人。这些内行专家在总撰官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各显其能,保证了《七略》的学术水平。

二

善于总结和借鉴书目工作的经验,是《七略》取得光辉成就的重要因素。在它形成之前,书目工作的内容已在四个方面先后产生,从史书和依《七略》改编而成的《汉书·艺文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七略》吸取了前人的这些经验,融会贯通,运用到自己的书目工作实践中。

校勘图书。现在已和书目工作分途,但在竹木简策为图书形体的古代,它是书目工作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据郑玄《诗谱·商颂谱》记载,周朝幽平年间,宋大夫正考父已有过校书的实践。春秋末年,孔子对几部经书进行删定,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图书整理工作。古者“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6]整理的方法,照孔子自己说:一是尽量保持图书的原样;二是删去荒芜杂乱的篇章;三是排斥一切不合中庸之道的议论。孔子以后,对图书还有过几次整理工作。参照历史上这些校整图书的实践,刘向等人根据当时图书散乱的实际情况,他们首先从校讎入手,互相补充订正,然后确定著录的正确本子,从而保证了所录图书的质量。

叙录图书。这种方法,发展到今天,就是为了揭示一部图书的思想内容所作的内容提要。在孔子整理图书的同时,由于竹木图书的翻阅不便,也给每篇写了叙录,因为它对于宣传图书指导阅读很有帮助,所以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得到了发扬。对自己的每一种著作都写一篇自序,来介绍其宗旨大意。汉代,叙录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刘安《淮南子》一书的《要略》、司马迁《史记》卷